

上海人民出版社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 第四辑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编

014034287

D691.2
115

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 第四辑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



北航

C1722423

D691.2
1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4辑)

ISBN 978-7-208-11931-4

I. ①国… II. ①复…②哈… III. ①中央与地方的
关系-政治制度史-中国-古代-国际学术会议-文集
IV. ①D69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78045号

责任编辑 顾兆敏

封面设计 赵小凡

技术编辑 伍贻晴

·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四辑 ·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学社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5.5 插页 6 字数 225,000

2014年2月第1版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8-11931-4/K·2137

定价 38.00元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

目 录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1
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	
——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	
.....包弼德(Peter Bol)	7
朝廷的地方关注:地名的证据	
.....罗志豪(Erhard Rosner)	25
江南三角洲圩田水利杂考——国家与地方	
.....滨岛敦俊	34
前倨后恭:明后期至清前期江南士人与地方社会	
.....范金民	53
日文史料中的中国经济活动	
——中国北方的区域经济网络	
.....顾琳(Linda Grove)	88
银价贬值与清末中国的国际贸易收支	
(1874—1911年)	
.....林满红 梁启源 郑睿合	102
乡村土布业与县域经济社会——以高阳为例	
.....王玉茹 张 玮	130
城市空间扩展的尺度定义和条件	
.....满志敏	140

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

——晚清龙泉县《光绪三十三年吴绍唐等侵吞

积谷案》简析包伟民 149

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

.....吴松弟 164

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

金钱会事件(1850—1862年)

.....罗士杰 181

圆桌会议:如何看待国家视野中的地方

.....主持人:顾琳 包伟民 224

“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

2012年5月18日至19日,由哈佛燕京学社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国家视野下的地方”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哈佛燕京学社是享誉全球的学术重镇,每年资助一定数量的东亚地区学者赴美参与研究访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与哈佛燕京学社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学术交流及合作。迄今为止研究所共有8位学者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研究访问。

这次会议共有13位报告人,分别来自美国、日本、德国、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学者的学术背景涵盖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等各个领域,体现了这次会议是一次跨学科的国际学术会议。

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首先由会议召集人、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吴松弟教授致辞。吴教授回顾了本所创始人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区域差异方面的创见,阐述了历史地理学的研究特色,点明了本次会议的主旨和意义。随后,哈佛燕京学社的代表、日本上智大学顾琳(Linda Grove)教授,代表哈佛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教授致辞。裴教授在信中回顾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和哈佛燕京学社之间深厚的学术渊源,并预祝本次会议成功召开。之后,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处长杨志刚教授致辞。他用“非同凡响”来形容哈佛燕京学社和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共同举办的本次会议,对会议的国际化程度表示肯定,并高度赞扬了两个研究机构共同研究开发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致辞结束后,与会代表在复旦大学光华楼前合影留念。

18日上午的主题报告由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葛兆光教授主持。首先由来自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做题为“论地

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的主题发言。包教授从自己对浙江金华的研究入手,介绍了地方史研究在中国和欧美学界的差异,并以近年来欧美学界对地方史的典型研究为例,介绍了欧美研究地方史的五种路径。提问的焦点主要针对“施坚雅模式”的借鉴和批判、核心-边缘理论在实例中的运用等问题。第二个主题报告来自德国哥廷根大学汉学系罗志豪(Erhard Rosner)教授,题目为“帝王眼中的地方区域:以地名为例”。罗教授以他即将出版的关于中国地名的新书为基础,主要介绍了西方对于中国地名的研究,并以不同朝代几种不同类型的地名为例,研究中国地名的演变以及从中所展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关系。提问聚焦于地名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地名变更与政府机构等问题。

18日下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李天纲教授主持。第一个报告是台湾暨南大学历史系滨岛敦俊教授所做,报告题目为“国家与地方:弘治正德年间江南三角洲的水利改革”。滨岛教授以自身对江南水利史近五十年的学养为基础,讨论了江南的圩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探讨了17世纪以常熟为样板的江南水利改革,以及由此所引发的赋役改革及城居地主等问题。评论人朱海滨教授补充说明滨岛教授对于江南水利史的学术关怀及研究取向,与会者还对江南区域的代表性、开发史的单线进化模式以及城居地主等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第二个报告来自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题目是“‘苏样’、‘苏意’:明清苏州领潮流”。范教授在研究明后期至清中期苏州的社会时尚的基础上,阐述苏州在当时全国引领时尚潮流的作用,进一步深化对明清生活史和社会史的研究。评论人张晓虹教授认为这是一篇关于前现代社会消费文化的经典研究,随后的讨论集中在大众文化研究中的士大夫文化与普通士人文化之间的关系、苏州士人和安徽商人在创造苏州文化中的互动等问题上。第三个报告来自顾琳教授,题目是“研究中国商业惯例的日语资料:对中国华北地区性商业网络的研究”。报告主要介绍了明治以来各种关于中国商业情况的日语资料,由此研究商业网络在华北地区的形成。评论人上海社科院王敏教授点明了这一研究是讨论中国如何进入经济全球化的具体过程,并指出外语文献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讨论主要围绕对中、

日语资料可信度的判断、日语资料数字化的最新进展等问题。第四个报告是来自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的林满红研究员,题目是“银价贬值与中国的国家贸易收支(1874—1911年)”。该研究充分结合历史学和经济学各自的优势,探讨清末汇率的变化趋势、国际贸易中的汇率及非汇率因素、地方经济对国家层面上国际贸易的影响等重要问题。评论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李丹教授从经济学的角度,对于国际贸易在当时经济体中的影响程度、进出口贸易中市场需求的影响以及不同产品的需求弹性等关系提出讨论。第五个报告来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王玉茹教授,题目是“乡村土布与现场经济社会:以高阳为例”。报告以新发现的20世纪30年代对于河北高阳县工业和社会调查为基础,探讨了中央和地方、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乡村工业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评论人复旦大学历史系冯贤亮教授赞赏这种将经济史和政治史、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叙述方式,与会者的讨论则关注于军阀政府对县级政府的影响、高阳土布业与新式布业的关系等。

19日上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张晓虹教授主持。首场报告是史地中心满志敏教授的“清末地理知识大发现下的地方与中央互动关系”,主要研究近代传统舆图向现代地图的转变,介绍了研究者长期收集的多幅地图。评论人韩昭庆教授肯定了该报告在地图史研究中关注国家和地方的新视角。讨论集中在近代地图编绘过程中,西方传入的正切投影方式如何与中国传统的计里画方相结合、近代日本绘制的中国地图与《大清会典》图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上。随后,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的包伟民教授报告“社仓弊案与地方社会:光绪三十三年龙泉县吴绍唐等侵吞积谷案简析”。该报告利用收集、整理中的浙江龙泉县司法档案,考察地方基层机构的运作方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评论人安介生教授认为该报告研究视角独特、材料解读深刻。关于这一报告的讨论集中在近年来地方史学者在收集地方档案的新动向,以及如何运用地方档案挖掘民众的声音等问题上。之后,吴松弟教授报告“国家科举与地方家族文化:对浙江泰顺旧家谱的分析”,评论人李晓杰教授肯定了报告人利用家谱将科举和家族相结合以及基于田野考察的研究方法。讨论集中在编修家谱和进士功名之间的逻辑关系、家谱的文化资

源是如何从晚清延续到现在等问题上。

19日下午的报告由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和公共政策学院的潘天舒教授主持。首场报告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罗士杰的“地方宗教传统与‘去中心化’的地方政治：重探温州金钱会事件(1850—1862年)”。报告人从西方史学的视角出发,对于“金钱会”事件中的宗教因素和政治因素进行深入分析,反思了“宗教动员论”。评论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的钟翀副教授对罗氏所提交论文中史实的准确性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讨论了地方宗教观念。与会者的讨论集中在“金钱会”组织的地方特性是如何体现、个案的代表性程度等问题上。最后的报告是亚利桑那大学东亚系副教授吴疆及地理学院童道琴助理教授共同合作的“中国区域宗教系统的GIS数据模型及其空间分析”。该报告以施坚雅九大区域为框架,以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宗教寺庙数据为基础,对区域宗教系统进行空间分析,对宗教寺院在空间区域的聚集性、寺庙分布与交通的关系,以及区域宗教系统的核心-边缘等方面得出研究结论。评论人满志敏教授充分肯定了对大区域内宗教现象空间分布的研究方法,并对进一步提高数据的时间精度及多要素分析提出建议。与会者对于区域宗教系统概念的提出、数据存在的缺陷及空间分析方法的运用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会议的最后一个环节是由顾琳教授与包伟民教授主持的关于“国家与地方关系”的圆桌讨论。顾琳教授首先抛出何为国家、何为地方的问题,由此各位与会代表对于国家和地方在地理范围、行政区划、想象构建等不同层面中的差异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于地方史和王朝史之间的延续和割裂、从上向下和从下向上的研究路径展开讨论。在这一论题下,与会代表进一步探讨了西方史学研究范式在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关系上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包伟民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和地方之间大多数是和谐的,并不像西方历史中所表现的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对立。他以同乡的概念为例,认为以中国政区为基础的地方认同反映了中国文化中可以较好地协调国家和地方的关系,因此地方和国家的观念是相对的,并不存在二元对立关系。安介生教授则强调了理论研究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王玉茹从经济史的研究模式出发,提出对于地方史个案的研究要有前提

限定,避免过度推广。包弼德以手绘“九州”和“五服”的方式,回应了包伟民教授所质疑的中国史学研究在应用西方理论时存在的水土不服问题,认为中国史学传统中也存在着模式与理论:“理论就是理论”。罗志豪博士提到西方中国史对国家和地方之研究中的缺陷,而林满红研究员以铜钱的发行和使用为例,将会议的讨论拉回到国家和地方的互动关系。朱海滨教授提出对地方史的研究应落实在具体的案例中,从中提出不同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这样才能进一步推进地方史的研究。吴松弟教授认为地方史的书写应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充分重视地方特色。韩昭庆教授从地图史的角度讨论了国家和地方关系的呈现形式。潘天舒教授也从人类学的角度提及空间转换对认识该问题应该会有所助益。最后,来自美、日、德的三位学者分别从自身的现代生活经验出发,叙述了在三个国家中国家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为会议的结束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论地方史在中国史研究中的地位

——以欧美近十多年的研究为例

包弼德(Peter Bol)

中国史是世界史的组成部分。那些对世界史感兴趣的学者,他们只关注欧洲列强、美国,最后是日本强烈干涉中国内政的这段历史。这些列强的干预打破了帝国传统的统治方式,迫使中国的政治精英们认可中国只是全球关系中的一个参与者,在这种关系中,其他的参与者并不比中国差。然而,我认为,今天中国史让我们感兴趣应该是它让我们思考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许多复杂的社会里普遍存在。例如,如何解决中央政府与地区之间的紧张关系?教育在造就国家精英的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等,地方史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帮助我们思考人类史中的一些大问题。这篇文章拟探讨哪些大问题引起了英语世界的学者对中国的关注,换句话说,从中国范围之外进行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中国地方史中哪些问题是重要问题。

在中文中,“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史料中发现的地方几乎都是指政区。顾名思义,政区由政治制度决定。然而,正如所有读过宋代以来方志的人们所知道的一样,作为空间单位的地方是超越朝代的,朝代会更替变换,但是,即便地方是朝代的产物却延续下来(尽管实际上它在许多方面也会发生变化)。

很明显,按照史料来界定地方是一种务实的做法。然而,这种做法也有些问题。首先,地方志把地方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世界和分离的空间,并把它描述成与其他地方毫无关系的历史存在的做法很成问题。地方史料以一种自下而上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信息,但是,它们关注政区界定的空间却模糊了那些跨界的现象,这些现象包括叛乱、自然灾害、贸易活动以

及农产品的流动等,它们会对许多地方同时产生影响。其次,我们的资料也提供了许多同时存在的有关地方的定义:州志与县志、镇志同时并存。同时地方的范围在这些方志中可能被放大或者缩小,可以把它们缩小到镇和建筑群的空间范围,也可以把地方的描述编汇在一起,形成国家调查的资料。总志的编纂自宋代开始增多,如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如果那些过去热衷于以“地方”的范围来记事的人没有假定一个连续的记录对象的话,那么,地方史又如何能确定其探究的对象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热衷地方史的人们一直在出版描述地方史的著作,目前这样的著作已数以千计。随着数量的增多,一些地方史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详细,另一些却越来越笼统。

就我而言,从地名的含义来研究地方是因为我想把人们的想法和他们的做法联系起来,我想理解是否特定地方的人对这个地方的看法会对他们的行动产生影响。既然所有的政区都有一个名字,如金华县、婺州等,我们会想,这些名字有特殊的意义吗?我的个案研究“南宋和元地方史的兴起:历史、地理和文化”显示,一些地方文人确实在刻意地方打造地方特色^①,吴师道的《敬乡录》就是一个例子,但是此文内容较为宽泛。南宋时期,盛行为地方命名的风气,婺州也是如此,一些地方学者为婺州创造了这个地名,这个地名代表特定的含义,而这个含义确实对当地的文人的行为产生了一些影响。研究当地或者地方的另一种方式是把“地区”当作一个不受感觉影响的空间构造来研究,毕竟,自然环境对社会同时产生约束和机遇。然而甚至是这种替代方式——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的著作对此作了大量的研究——也要求来自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们普遍的认可,尽管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已作过一些重要的微观研究^②,但是我们这些研究中时期历史(middle period history)的学者仍然缺乏可以把研究深入到地方一级的数据资料。

我要指出的是,使用英语和欧洲语言的学者所做的有关8世纪到

① 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2001): pp.37—76.

② Robert Hartwell, "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2.2 (1982): pp.365—442.

15 世纪的中时期的学术研究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汉语资料以及中国关于时空概念的术语。另外,它也吸收了来自日本的研究,日本主要有东京和京都两个学派^①。对后来的学者而言,不完全这样,因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日本之外兴起了新的历史观,另一方面欧洲和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更容易接受来自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知识以及西方近代史的研究方法。

尽管我怀疑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学术界存在着真正的国家或者地区的视角,但是学者通常以地方语言参加学术讨论,强调对听众感兴趣的问题。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将介绍用英语发表的地方史的著作。在英文的学术圈里(我想中文的也一样),“地方史”比“地区史”用得更普遍。本文主要考察研究当地的不同方法,不过也会涉及推进地区视角研究的依据。

一、关于当地的描述

毫无疑问,地方史关乎“地方”,或者用更抽象的话来说,指地理空间中有名字的地点。有关地方史撰写的习惯可以追溯到中国中古时期,但是到了中时期,系统收集、不断补充地方史的信息变成了官员和学者的一项工作,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格式化,并一直持续到了二十世纪,^②地方志及其前身图经最能体现这种传统。南宋时期,这些地方文集就已经被学者私下当作编纂地方概述的重要资料,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和祝穆的《方輿胜览》是现存最重要的两种著作。^③尽管王和祝是为有文

① Richard von Glahn, “Imagining Pre-Modern China,” *The Song-Yuan-Ming Transition in Chinese History*, eds. Paul Smith and Richard von Glah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

② 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2001), James M. 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6.2 (1996).

③ Wang Xiangzhi 王象之, *Yu Di Ji Sheng* 《舆地纪胜》, Zhongguo Gu Dai Di Li Zong Zhi Cong Kan (Beijing: Zhonghua shuju, 1992), Zhu Mu 祝穆 and Zhu Zhu 祝洙, *Song Ben Fang Yu Sheng Lan* 《宋本方輿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年)。

化的读者编纂了这两套书,但是他们没有把自己当作地方史学家,祝穆书的结构(仿照了王的)成为《大元大一统志》及其之后的朝廷编纂的全国总志的范本。^①

地方志的编纂者假定一个给定的地方有着自身的历史,尽管他们认识到描述的政区可能会随着岁月的推移发生巨大变化,但还是试着描述这个历史过程。地方志内容不断增加的特点从他们的序和凡例中清晰可见。编纂人员不仅经常要参考以前的版本,有时他们会批评前人的写法,通常还会介绍自己的编纂方法,然后声称这些方法优于前人的方法。认识到地方志是一种回溯性的记录很重要,这种记录是为了当时而偶然产生的对当地的一个描述。编纂者富有历史的头脑,而且经常包括他们对记录的东西的一些政治和道德方面的评价,但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这些并不是历史著作:他们没有利用过去的证据来确定并解释历史的变迁。这种缺乏解释为何变迁的兴趣不仅是地方史的特点,我们在国史的编纂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态度。地方志的编纂者有时认为,国史和地方史相似,最有名的一句话是“国有史,方有志”。20世纪80年代重新编纂出版地方志,不过采用一套新的由政府规定的体例。从那以后,国家和私营出版社出版了一系列为数众多的有关地方大事记、旅游景点、人以及建筑等方面的书籍和杂志,今天描写某个地方的特别之处及其优于其他地方的原因再次成为合情合理之事。

国外学者不像地方志和它的现代形式那样来描写一个特定的地方,但是他们研究地方志编纂的现象,也许我们可以把这方面的研究归纳到“信息史”的领域。人们从许多角度对地方志里的地图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有卜正民(Timothy Brook)关于16世纪的人们是怎样努力建立一种新的地方志的绘制方法的^②,胡邦波关于宋代方志制图的政

① Bolanxi 李兰盼, Jin Yufu 金毓黻 and An Wenpu 安文溥, *Da Yuan Da Yi Tong Zhi*: 1300 Juan (Cun Juan, Juan, Juan 544—545, Juan 548—550, Juan 634, Juan 730—731, Juan, Juan, Juan 790—792), Ji Ben 4 Juan, Fu Kao Zheng 1 Juan, Fu Lu 1 Juan《大元大一统志》: 1300卷(存卷,卷,卷544—545,卷548—550,卷634,卷730—731,卷790—792),辑本4卷,附考证1卷,附录1卷, *Cong Shu Ji Cheng Xu Bian*(上海书社,1994年)。

② Timothy Brook, “Mapping Knowledg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Gazetteer Cartography of Ye Chunji,”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 Gest] East Asian Library Journal* 7.2 (1994).